

西南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

对话与重建

——中国现代诗学札记

吕进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话与重建

——中国现代诗学札记

吕进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与重建——中国现代诗学札记/吕进著.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4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吕进主编)
ISBN 7-5621-2746-8

I. 对... II. 吕...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现代—文集 IV. I207. 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066 号

对 话 与 重 建

——中国现代诗学札记

吕 进 著

责任编辑:卢渝宁

封面设计:王正端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北碚 邮编:400715)

印 刷: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

字 数:321 千

版 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 7-5621-2746-8/I·135

定价:25.00 元

总 序

吕 进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是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位点部分导师的最新著作集锦,第一辑一共8部。此前,在1998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出版过学位点的论文选集《现代文学沉思录》。

对于人才济济、硕果累累的现当代文学学位点,仅仅出版第一辑显然不够,我们计划在明后年编辑出版第二辑、第三辑。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实力、优势和特色的“老”学位点,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抗战文学研究、西部文学研究均具相当基础和规模。一支年轻的主要由教授和博士构建的学术梯队组成了西部学术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学位点早在1985年就开始招收硕士生,已先后有15届硕士生毕业。学位点带头人在1996年增列为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199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已有两届博士生毕业。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位点建设始终得到学界前辈的热情关怀,得到同行的支持和帮助。在1993年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全国硕士点查评中,专家组除了对学位点给予好评并评定为

“A”级外,还在向学位办反馈的《专家组意见》里特地提出了“尽快建成博士点”的期望。这个期望一直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召唤着我们。

9年过去了。作为学位点带头人,我深感内疚:愧对学界的期望,也愧对9年来在学位点建设上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的同事们。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丛》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间世的。

近几年来,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21世纪中国的辉煌一页,这是举世瞩目的一场静悄悄的然而非常深刻的革命性过程。在实践中,人们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西部大开发既是西部经济资源大开发,又是西部教育资源大开发。因为,西部大开发的最后落脚点不在其他,而是在人。经济的高度发展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的竞争:人才竞争,人的文化程度的竞争,人的素质的竞争。人,正是教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对象物。完全可以说,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经济。大力发展教育,尽快改变西部教育相对滞后的现状,就是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明慧选择。

重庆素为西部重镇与中心。禹分九州,即有巴蜀。在上世纪中叶,重庆曾为抗战时期的陪都,近年又为中央直辖市。重庆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中心。西南师范大学所在的重庆北碚也是一座文学“故事多”的美丽“小城”,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底蕴丰厚之地:梁实秋的“雅舍”,老舍的故居,复旦大学夏坝旧址,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都在诉说着北碚的昨天。当年,老舍、林语堂、梁实秋、端木蕻良、萧红、胡风和“七月派”诗人云集在这座小城。郭沫若、茅盾、冰心、艾青、田汉也常来北碚讲学和从事文学活动。20世纪的一些名著,如《四世同堂》、《雅舍小品》即诞生于此。西南师范大学又是文化名人吴宓在新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现

在，西部大开发给我们提供了发挥历史积淀的新条件。

我们学位点面临少有的历史赋予的发展机遇。这是我们的幸运。

同时，我们又遭遇严峻的挑战。这是我们的使命。

作为一所国家教育部直属大学的重点学科，作为西部唯一的中央直辖市——重庆的重点学科，我们应当有所作为。我深信，我的同事们一定会付出更多的努力，把学位点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学位点的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为西部大开发、为重庆直辖市的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最后，谢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是他们的支持，《文丛》的出版才能得以从计划变为现实。

目 录

总序	吕进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	(1)
在求实、创新、多元的氛围中勇敢探索	
——中国新时期诗歌研讨会开幕词	(22)
21 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两个课题	(32)
新诗的沉寂年代	(38)
新诗呼唤拯衰起弊	(46)
华文诗歌：交流与发展	
——’93 华文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	(52)
感情，诗的直接内容	(56)
诗家语	(62)
传统诗歌与诗歌传统	(67)
诗的生成	(85)
诗的寻思	(98)

诗的寻言	(117)
新诗艺术表现中的虚与实	(138)
诗人是文明的“原始人”	(154)
诗人的修养	(161)
诗,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和谐	(174)
写诗与读书	(182)
弹性:诗人与读者的互动关系	(187)
女性诗歌的三种文本	(192)
诗体十题	(203)
闻一多的“豆腐干”——《死水》解读	(203)
徐志摩的对称体——《雪花的快乐》解读	(206)
冯至的十四行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解读	(209)
晓凡的汉俳——《琴手》解读	(212)
郭小川的新格律体 ——《甘蔗林——青纱帐》解读	(215)
袁水拍的仿民歌体——《一只猫》解读	(218)
自由诗的纯度——艾青《鸽哨》解读	(220)
自由诗的清洗——余光中《今生今世》解读	(223)
自由诗的几种言说方式——舒婷《致橡树》解读	(226)
小诗的艺术——冰心解读	(229)
对再生的呼唤 ——重读郭沫若《凤凰涅槃》	(233)
作为诗评人的闻一多	(237)
何其芳的《预言》	(251)
邓均吾:创造社一个不应忘记的姓名	(267)

作为诗体探索者的臧克家	(283)
作为诗体探索者的贺敬之	(291)
梁上泉歌词印象	(297)
《文晓村自传》:诗穷而后工	(314)
重庆“三套车”	(318)
新时期重庆文学理论与评论的发展概况	(322)
山里人唱的都市歌谣	
——序谭朝春《让日子站起来》	(326)
诗集《羞涩》的双重性艺术	(330)
不惑风采:《星星》及其《四十年诗选》	(334)
台湾诗坛坐标上的《葡萄园》	(343)
余光中的诗体美学	(357)
诗风拂面育新人	
——《西南师范大学 50 年诗选》序	(370)
对话与重建	
——《现代诗歌文体论》自序	(374)
《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前言	(378)
 附录一:作者小传及主要著作	 (384)
附录二:学术反响选录	(386)
吕进的诗论与为人	(386)
一个新体系的构建	(389)
对吕进诗学体系的简单理解	
——读《吕进诗论选》 兼谈吕进诗论的学术品格	
.....	(393)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以抒情诗为中心的中国诗歌历来被看作是文学中的文学。由于诗的辐射与渗透,诗美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样,诗论是文论中的文论。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诗论是它的源头和带头学科。一部中国古代文论史基本上就是诗论史。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实现了从抒情到叙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移,新诗在现代文学图谱上的坐标发生变化,现代诗学也面临崭新的理论课题。

中国新诗研究几乎与新诗同时起步。1918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 4 卷 1 期发表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 9 首诗,通常被视为新诗的最早作品。胡适的著名论文《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被誉为初期新诗研究的“一根大柱”(茅盾)和“金科玉律”(朱自清)。这篇文献写于 1919 年 10 月,比 9 首作品晚 2 年,却比胡适 1920 年 3 月出版的诗集《尝试集》早了近半年,而《尝试集》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个个集。

但是,新诗研究在其后的发展并不理想。与古代诗学这座富矿相比,现代诗学一直是一个贫瘠地带。究其原因,大概有三:其

一,新诗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急先锋。但是由于对“新诗”的“新”的误读,新诗发展得不尽如人意。而理论的发展从来要仰赖理论对象的发展。其二,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理论是中国诗学的现代形态。但是由于“五四”时期开始的对传统文化情绪化的偏激态度的影响,新诗理论与几千年传统诗学基本隔断,造成自身贫血。其三,现代中国长期的战争与动荡的生存环境,使得新诗缺乏自我关照的外在条件。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新诗研究只留下了艾青的《诗论》^①和朱光潜的《诗论》^②等为数极少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它们,刚好代表了现代诗论的两种范式:诗人谈诗与理论家谈诗。诗人谈诗的基本出发点是将诗保留为诗,往往是化入诗的内部去谈诗。他是感性的、印象的、经验的,同时又是非体系的、准科学的,诗论往往只是对于他自己读诗时的接受状态的描述。理论家谈诗的基本出发点是将诗化为学术研究对象,往往是站在诗的外部谈诗。他是智化的、演绎的、分析的,同时又是推理的、学理的。诗论往往是对诗的非诗化处理。两种范式的相反相成是诗学的最佳结构。对于中国诗学而言,更缺少的是理论家。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的。

20 世纪下半叶新诗研究的三个时段

20 世纪下半叶的新诗研究,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段。

第一个时段,政治论诗学时期:1950~1978。

这个阶段,除了亦门的《诗是什么》(1954 年,新文艺出版社),晓雪的《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1957 年,作家出版社)和杨匡汉、杨匡满的《战士与诗人郭小川》(1978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外,几乎没有专著。论文不少,但学术含量高的不多。论文集比专著多,择其大要,有唐湜的《意度集》(1950年,平原社),劳辛的《诗的理论及批评》(1950年,上海正风出版社),亦门的《诗与现实》(1951年,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何其芳的《关于读诗和写诗》(1956年,作家出版社)与《诗歌欣赏》(1962年,作家出版社),沙鸥的《谈诗》(1956年,作家出版社)等三本书,公木的《谈诗歌创作》(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袁水拍的《诗论集》(1958年,作家出版社),安旗的《论抒人民之情》(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论诗与民歌》(1959年,作家出版社)与《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初探》(196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田间的《海燕颂》(1958年,北京出版社),徐迟的《诗与生活》(1959年,北京出版社),沈仁康和黄佩玉合作的《抒情诗的构思》(195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臧克家的《学诗断想》(1962年,北京出版社),易征的《诗的艺术》(197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和郭小川的《谈诗》(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对新的时代,诗人们的共同感受可以用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这个诗句来概括。创造新时代的新诗学,这是共同愿望。创造之路取得了成果,主要表现在使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引进。但是在寻求美丽梦想中却出现了不美丽的失误:主要是在诗与政治的关系上。这个时期充当主流话语的是政治论诗学。在50年代后期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政治论诗学恶性膨胀,在“文化革命”中流行一时、危害一时的“武装”论、“工具”论、“哨兵”论是它的自然延伸。

诗歌不可能完全拒绝政治,诗歌与政治总是处于无法、也无须割断的内在联系中。诗歌史证明,并非诗歌只要与政治相联系,就会贬值或毫无价值。在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政治性很强的著名诗人和著名诗篇。尤其是在现代中国,政治是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的现象,也是介入人的生存环境、心灵世界的最强大元素。但是政治论诗学从阶级论和政党论来定义政治,

使“政治”扭曲化和狭窄化；从扭曲化、狭窄化的“政治”来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全部感情生活，将抒人的本真之情与抒人民之情人为地对立起来；只从“政治”维度定位诗歌，将诗歌与现实政治定位于从属关系，忽略诗的文体可能，要求诗负担许多诗外承载。政治论诗学与诗歌相隔膜，很难推动新诗的繁荣。从诗的文体特征和发展规律出发的著作成为凤毛麟角。

在这个时期对新诗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何其芳。何其芳对诗的文体特征有比别的同时代人更多的敏感和注意。作为有成就、有文化教养的诗人，何其芳从40年代开始就对新诗的形式建设有所思考。1953年，在北京图书馆的一次讲演中，何其芳提出了他的关于诗歌的著名界说。这个界说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一直被视作诗歌的经典性定义。在同一年，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创立中国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次年发表了论文《关于现代格律诗》，具体、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于创立现代格律诗的思考。他的现代格律诗设想的影响一直及于现在。何其芳的贡献成为政治论诗学时期新诗研究耀眼的亮点。

第二个时段，观念更新期：1979～1986。

这是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又一个高潮期，也是中国新诗研究的转型期。

观念更新期出现的语境，是随着“四人帮”垮台而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70年代末期的中国是回顾的中国，批判的中国，反思的中国，梦醒的中国，是思想冲破牢笼的狂欢年代：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无论它曾经拥有什么样的存在理由，都要在新时代的反思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失去继续存在的权利。

新诗大丰收。“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大合唱。新诗研究迎来异常活跃的时期——从对“文革”诗歌的反思渐渐扩展到对“文革”前诗歌的反思，从对历史的反思渐渐走向美学意义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主要突破是诗学观念的更新，内核是对诗学与政治的关

系的重新认识,诗歌观念是诗学观念的中心。

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从新诗的开山作《女神》(郭沫若,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以降,新诗与生俱来地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庄严的使命意识。在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动荡中,新诗披露民间疾苦,吟唱民族心声,成为除夕将近的空中的凤凰。但是,诗终究是诗,它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在走过了几十年曲折的道路之后,在思想大解放运动之中,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更新:诗不是要拒绝政治,但是,诗常常是对人的本真存在的歌唱,是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诗与政治的联系只能通过诗的渠道、在诗的文体可能之内实现。在新诗初期,一些新诗先行者从当时的政治出发,单纯强调“白话”,却忽略“诗”,结果,大量“白话诗”只有“白话”而没有“诗”;在后来的长时期内,一些诗人单纯强调“新”,却忽略“诗”,结果,大量“新诗”只有“新”而没有“诗”。“文化革命”是离开诗去写政治的极致,新诗几乎毁灭。在70年代末期,《星星》诗刊首先提出了“诗就是诗”的口号,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的权威刊物《诗刊》发动“诗是什么”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发表探索性意见的空间。与传统诗歌同源异貌的朦胧诗的出现,更从创作实践上推动了诗歌观念更新的势头。

诗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诗学观念的另一个中心。在诗歌观念更新中,诗回到了自身;同样,在诗学观念更新中,诗学也回归本位——人们认识到:诗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仅仅是诗;而且,必须从符合诗的美学本质的途径去接近、打量诗歌。虽然政治也不失为诗学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诗学不应是政治论文,不应是政策解说,它应当具有科学品质和独立的学术人格。

在这个时期,新诗研究成果很多,探索成为时尚,争鸣席卷诗坛。到了8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专业诗评家队列,这些诗评家分布在高等院校、文学研究机构、作家协会与刊物编辑部。在过去年代,除了安旗,中国没有专业诗评家。现在,可以开

出一份长长的当时已经知名的诗评家名单：丁力、宋垒、闻山、李元洛、丁国成、陆耀东、龙泉明、尹在勤、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钟文、杨匡汉、朱先树、袁忠岳、叶橹、杨光治、吕进、陈良运、骆寒超、吴开晋、吴欢章、孙光萱、张同吾、古远清、古继堂、任愆等等。这份名单包括了那些兼写诗评的诗歌编辑，但没有包括为数不少的兼写诗评的诗人。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1986年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经出现了专业的新诗研究机构。诗评家们无一例外地参加到诗学观念的争鸣中。谢冕颇具影响。他对新的时代趋向和新的诗歌现象的感应很敏锐，长于站在潮头的前头，以时代的标尺考量诗学问题，他的诗论给人的联想与启示就不止于诗歌。他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推动诗学观念更新的论文。1983年，谢冕推出了他的论文集《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

诗学观念更新带来诗学研究重心的移动：由外向内的移动；由客体向主体的移动；由批判向建设的移动；由一向多的移动。

研究视野扩大。在政治论诗学时期，新诗发展史十分单薄。一些诗人和流派没有资格进入视野；而进入视野的，他们的艺术探索往往又不是研究对象，因此，研究对象受到的评价和他们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差距；随着国内频繁的政治运动，一批批诗人和诗歌流派受到不公正待遇，陆续从研究视野消失，新诗发展史越编越薄。诗学观念的更新，使得诗学的研究对象恢复了多姿多彩的面貌，诗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诸如胡风、绿原、阿垅、曾卓、冯雪峰、穆旦、穆木天、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林徽因等等诗人和小诗诗群、湖畔诗派、“中国诗歌会”诗群、象征派、现代派、新月派、七月派、九叶派等等流派都成为研究对象，得到重新评价。

诗学著述本身的文体革命。诗学著作和学术论文的言说方式和政治论诗学时期拉开距离，不仅学术品质提高，原创性含量增多，而且在语言符号系统的陌生化、新颖化、诗化上实现了自身的文体革命，获得了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文体外貌。

创作方法上的独尊现实主义的一元化诗歌格局消解。在此一时期。中国形成了三大理论群落。以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他们是:传统派、崛起派和上园派。

在当代中国能够形成学派,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在政治论诗学时期,传统派的观点在新诗研究领域居于至尊地位。由于没有其他理论群落,所以也没有“传统派”之称。传统派认为,诗坛上有古风、洋风、国风三派,他们赞同国风派。按传统派的代表人物丁力在《新诗发展管见》一文中的说法,传统派是“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派”。^③中国诗学具有悠久传统。优秀诗学传统在一代代传承中获得神圣性,在影响社会多数成员的审美趣味和语言理想中获得广泛性。任何时代的诗学都不可能跳出历史的上下文。传统缺席,现代诗学将会因为失去几千年的诗歌文化蓄库而沦入浅薄和粗俗。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诗学传统的批判多于传承,这虽然是转型时期的常见现象,但是它也确实是新诗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大地上立足不稳的重要原因。应当说,传统派的主张是有其科学依据的。传统派的局限在于:他们对传统的理解是静止的(其实,传统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与时俱进),有传统主义倾向,因而多少有点“过去派”的形象,在大变革时代影响有限。

80年代中期,在朦胧诗的争鸣中,另一个诗论群落——崛起派登场。崛起派的贡献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理论主张,而在于它是解构中国诗学大一统格局的理论群落。对于新诗研究的打破思维惰性,克服习惯定势,调整感觉系统,开放知识结构,他们起到了突出作用。崛起派的冠名来自这个理论群落的三篇论文的标题: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崛起的诗群》。^④以倡导横的移植为主的崛起派,给新诗研究带来某种新的品质。他们对于变革的沉思来自诗而又不止于诗,他们

是变革时代的思想家。不过,崛起派的根基并不稳靠。因为,在他们的词典里,现代化往往与西化同义,新诗的现代化往往与西方现代派化同义。向西方现代派诗学借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西方现代派产生的文化场横向移到中国的文化场,是一种跨时空的文化转移,这里既有接受,也有本土化的解构和重组。在与中国优秀诗歌传统断裂中,崛起派表现出偏激与局限。崛起派是一个长于摧毁而不长于中国化的诗学理论的正面建树的理论群落。

在纵横交错点上出现的上园派使得 80 年代的诗学格局由二元变为多元,从此,“多元化”不再只是纸上的东西。在世界诸多事物的运动中,常常可以看到:当二元对立的时候,“第三”的出现总是起到拓宽思路、活跃全局的作用。“第三”往往带折衷性质,持更冷静、更客观、更全面的学术立场。在北京上园饭店 1984 年和 1985 年的两次诗学聚会中,一群中年诗评家发现了彼此的相近,决定“揭竿而起”,推出共同的诗学主张。上园派的冠名是在 1986 年。广州《华夏诗报》举行了一次关于诗歌的笔谈,在《编者按》中,该报编者第一次使用了“上园派”的名称,这个称呼后来被学术界所袭用。1997 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吕进主编的论文集《上园谈诗》,^⑤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上园派诗学。上园派可以叫转换派。他们像传统派一样主张纵的承传。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一承传是现代对古代的包容与发现,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应当对传统施行现代化的选择与转换。他们像崛起派一样主张横的移植。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一移植是中国诗歌对外国诗歌的包容与发现,新诗是现代形态的中国诗歌,应当对外国诗歌艺术经验施行本土化的选择与转换。古远清在《中国大陆 40 年诗歌理论批评景观》一文中评述道:“这三大诗论群体两头小中间大,上园派人数较多,且以中年为主。”^⑥

第三个时段,文体建设期:1987 年起。

1986 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推出“中国诗坛 1986 现代